

马克思对贫困的政治哲学思考

——对《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解读^{*}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马克思从社会整体观出发,对政治与社会关系作了哲学阐述。他批判了一个普鲁士人即卢格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导致以政治理智蒙蔽社会本能,无法认识到社会贫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无产阶级找到了消除贫困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他进而独特地阐释政治国家要消灭贫困,那它就应该消灭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从而消灭这个社会 and 作为它的产物的政治国家自身,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在关注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贫困之中,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以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贫困;政治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2010)05-0083-05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①是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针对卢格署名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而展开的论辩性文章。一方面,马克思反对卢格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澄清他与卢格的关系,表明他与卢格在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上的不同甚至对立。马克思是不同意卢格把织工起义之事看作是地方性事件,也不同意卢格对

政治的狭隘理解。在这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卢格政治观点的批判,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主要思想”^[1]。

一、马克思对卢格关于贫困认识的批判

马克思开篇批判一个普鲁士人即卢格对贫困的错误认识。卢格是把贫困问题置于伦理道德框架内思考,致使他看不到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普遍意义,而力图通过“基督徒之心的联合一致”消

* 收稿日期: 2010-03-05

基金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NWNU-QN0733); 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NWNU-KJXCXG-SK030313)

作者简介: 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和社会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

① 马克思这篇文章完稿于1844年7月31日,发表在当年8月7日和10日的《前进报》第63号和第64号。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写于1844年5月至8月间,这就说明,《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是马克思面对卢格对西里西亚起义评价不公,放下手头《手稿》的写作而针对卢格专门所写的论辩性文章,文章的许多观点值得重视。

除贫困,这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先来看看卢格在《改革报》的训导:“国王和德国社会还没有达到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改革的预感;甚至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起义也没有引起这种感觉。对德国这样的非政治的国家,我们无法使它认识到一些工厂区的局部的贫困是普遍的事,更不用说它认识到这种贫困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弊病了。这种事件在德国人看来,同任何地域性的水灾或饥荒性质一样,因此国王认为这是管理部门或者慈善事业的缺欠。由于整个原因,还由于用一支小小的军队就足以对付弱小的织工,破坏工厂和机器决不会引起国王和行政当局的‘惊慌不安’,是的,连敕令也没有受宗教感情的支配,因为敕令非常冷静地反映了基督教的治国才略,反映了那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它那独一无二的良药即‘基督徒之心得善良信念’面前,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贫困和犯罪,这是两大祸害;谁能治好它们呢?国家和行政当局吗?不行,而所有基督徒之心的联合一致却能做到这一点。”^{[2]375-376}

马克思对卢格的“训导”逐步地进行了分析,指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并不是小事,也不是区域性事件,它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从德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来讲,“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2]389-390}。从德国织工起义指向的目的和结果来看,“西里西亚起义恰恰在开始时就具有了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在结束本身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因而,他们最终是反对私有制社会的。这次起义“被毁掉的不仅有机器,即工人的这些敌手,而且还有帐簿和财产契据;其他一切工人运动首先只有打击工业企业的老板,即明显的敌人,而这次运动同时还打击银行家,即隐蔽的敌人”^{[2]390}。这说明,“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这难道不会引起国王的惊慌吗?行政当局出动军队镇压织工起义,就说明他们对织工起义的恐惧和害怕。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对社会革命是最能胜任的,它对政治革命是最无能为力的。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无能就是德国政治上的无能”^{[2]390-391}。可以说,“在一个国家,不需要一兵一卒就能压制住整个自由资产阶级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和宪法的愿望;在一个国家,消极服从已经成风气,——在这样一个国家而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来对付弱小的织工,能说不是一个事件,不是引起惊慌不安的事件吗?”这表

明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成就了无产阶级,使德国无产阶级比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更加成熟。他们不是通过政治革命,而是想通过社会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消除贫困。

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毫无建树,致使德国在政治上的无能。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国王的卑躬屈膝和软弱无能,消除了普鲁士国王的不安。对于国王来说,他的政治敌人或对立面是倡导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织工起义反对的是资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运动可以转化矛盾,“无产阶级要是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就会压倒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政治上的对立面,而使一切政治上的敌视都转向自身”。普鲁士国王反倒落个清静,从有趣和重大影响事件中产生愉悦。当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普鲁士国王选择的是一个国家首脑惟一能够选择的办法”,通过行政管理和慈善事业解决赤贫问题,卢格是不赞同这样做的,他认为增强基督徒的信念而采用规劝的办法会很好地解决赤贫和犯罪。马克思认为,这种把敕令描述为宗教情感的产物的人是不会理解社会运动的。

我们看到,贫困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就表明,解决贫困问题不能仅仅诉诸于政治手段,而且还要诉诸于社会手段。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3]533}从英国和法国当局对贫困的解决一事,便可以得以证实。英国资产阶级承认赤贫的出现应该归于政治,于是他们对赤贫采取大量政治行动,英国最初通过慈善事业和行政管理措施来消除赤贫,后来他们认识到赤贫不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后果,而是英国济贫税的后果,既然贫困是英国立法局的问题,英国当局就改变了消除赤贫的措施,从而确定英国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不再是消灭赤贫,而是对它强制管束,使它万古长存。这种行政管理机构拒绝采用积极的手段去堵塞赤贫的来源;它满足于每当赤贫涌出社会的表层时,就以警察般的宽容给它挖个坟墓”^{[2]383}。法国的拿破仑也要求自己的行政机关拟定在全法国根除行乞现象的计划,国民大会也下令消除赤贫。但其结果是:“英国又认为赤贫是由于穷人的不良意愿,正像普鲁士国王认为这是由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国民公会认为这是由于私有制的反革命的可疑的信念一样。因此,英国惩罚穷人,普鲁士国王规劝富人,国民公会就砍私有制的头。”^{[2]386}这些国家对赤贫的解决不是“采用管理措施和慈善事业,就是放

弃了管理和慈善事业”。他们不把赤贫和祸害的原因归于国家的本质,而是归于存在一定国家形式上,只是想用一种国家形式取代另一种国家形式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由于他们认识上的不足,这些国家不仅没能从根本上消除赤贫,而且使更多的人沦为赤贫。

二、马克思对贫困的政治解决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认为,我们思考关于解决赤贫问题时,不能仅仅使用政治理智,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可以说,“政治理智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缺陷”。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则中看出社会缺点的根源,相反,他们在社会缺点中看出政治弊病的根源”。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政治理智越在一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发挥得越充分,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线和精神界线,因而也就越没有能力发现社会缺陷的根源”^{[2]387}。这就是说,如果依靠政治理智去发现社会贫困,是徒劳的。马克思批判了卢格关于社会贫困产生于政治理智,而政治理智又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社会贫困产生理智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更确切地说,倒是社会丰足产生政治理智。政治理智是唯一论者;已经有些家当,已经惬意地过着优裕生活的人才能有这种理智。”^{[2]392}在这里,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看待社会贫困和政治理智的关系问题,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政治解放是通过政治革命来完成的,而人的解放就得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3]533}。这就是说,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然而,资产阶级“国家不消灭自身,就不能消灭存在于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及其善良意愿为一方与行政管理的手段和能力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本身是建立在这个矛盾上的。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因此,行政管理机构不得不局限于形式上的和消极的活动,因为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从哪里开始,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利也就在哪里告终”。而“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必须消灭自身,因为国家只是与私人生活相对立而存在。但是任何有生命的存

在物都不认为自己缺点的根源在于自己生活的原则,在于自己生活的本质,而是在于自己生活以外的环境。自杀是违背自然的,因此国家不会相信自己行政管理机构的内在无能,就是说,不会相信自己本身的无能”^{[2]386-387}。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国家越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么这个国家就越不愿意认为社会缺陷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的原则,在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它的行动的、自愿意识的、正式的表现就是国家——,就越不愿意理解社会缺陷的普遍原则”^{[2]387}。这么说来,政治理智的思考赤贫的社会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赤贫问题,反而让“政治理智蒙蔽了他们的社会本能”。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智越发达和越普遍,无产阶级就越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那种不理智的、无益的、被扼杀在血泊中的骚动上,至少在运动开始时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在政治形式上思考问题,它就会认为一切弊端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补救办法就在于暴力,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法国无产阶级最初的起义就是证明。里昂的工人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于是他们的政治理智弄得他们认不清社会贫困的根源,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2]393}。而对于德国来说,政治与哲学的发展之间的不相称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2]391}。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具有非凡的社会主义要素,于是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断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214}。

马克思对卢格的“凡是在人们不幸脱离了共同体和他们的思想脱离了社会原则这种状况下爆发的起义,就一定会被扼杀在血泊中和被扼杀在不理智中;可是一当贫困产生理智,而德国人的政治理智又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那时,这些事件在德国也就会被认为是某种伟大的变革的征兆了”的观点展开论辩,认为既然贫困产生理智,为什么卢格又把被扼杀在血泊中和被扼杀在不理智中混为一谈,既然贫困是产生理智的手段,那么流血的贫困更是产生理智的异常激动的手段。关于“人们不幸离开共同体”而言,这里的共同体不是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制度,革命的任务恰恰是要消灭这

个脱离共同体的状况。因为“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2]394}。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越有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5]269}。既然如此,马克思认为:“人比国家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一样更是无穷无尽的意义,消灭这种想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的。”^{[2]394}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发动社会革命,才会推翻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社会,坚持“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3]585}。而“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5]311}。这就意味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同时它也就消除了“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208}。

三、马克思对社会革命的政治哲学思考

马克思从社会整体观点出发,对社会革命进行了分析,指出社会革命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人们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才可以找回属于人的本质、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享受、人的真正共同体。人们应该是以政治理智认识政治贫困和政治革命,以社会理智认识社会贫困和社会革命。可以说,政治革命蕴含着政治灵魂,而社会革命蕴含着社会灵魂。我们从马克思跟卢格的论辩中看到,马克思是赞成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的说法,而反对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的说法的,马克思认为“具有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是拼凑起来的一堆废话,虽然这个‘普鲁士人’把‘社会’革命理解为与政治革命对立的‘社会’革命,可是他赋予社会的是政治灵魂,而不是社会灵魂。或者‘具有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只不过是从前人们所谓的‘政治革命’或‘革命本身’的同义语。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2]395}。也就是说,政治灵魂的

社会革命并不能彻底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因为“革命的政治灵魂就在于,没有政治影响的阶级期望着消除自己同国家制度和统治想脱离的状况。政治灵魂的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即抽象的整体的观点,这种抽象的整体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离开了现实生活,而且在人的普遍观念和人的个人存在之间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对立,这种抽象的整体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具有政治灵魂的革命,顺应这种灵魂的狭隘的和双重的本性,靠牺牲社会本身利益,在社会中组织起一个统治阶层”^{[2]395}。

马克思之所以来论证“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具有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2]395}。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的高度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再次论证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找到自己解放的积极要素。因此,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才可以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同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关于贫困问题。

总之,对马克思关于《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深入解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是不能消除贫困的,因为政治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意志的执行人,它自己不会采取一些消灭这些社会问题的措施,其原因在于:“如果政治国家要消灭贫困,那它就应该消灭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从而消灭这个社会 and 作为它的产物的政治国家自身。”^{[2]420}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社会革命是力求消灭一切现存关系的。这就为织工起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作了有力的辩护。

其次,马克思与卢格之所以对革命作出不同的评价,其实质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给予德国织工起义以最高评价,认为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发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中第一次重大事件。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卢格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之上否认无产阶级革命,认为一切革命都是政治革命,以此达到对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解决社会问题的否定。

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关注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贫困之中,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所在恰恰是与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紧密相连。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进行辩护,那么,这就构成当今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过于学院化,应该走出文本,面对社会,从学理上论证当前“社会分配不正义”所带来的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所不容忍的,像马克思一样通过批判,给当政者施加压力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这是实践的迫切需要。

最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整体观思想使我们看到,马克思是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待革命问题。他不是把现实的革命斗争转化为概念的对立和冲突,力图通过消除概念或者思维的冲突来解决现实矛盾,或者改变现实的贫困问题的,而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有清醒的认识。政治革命只能解决政治权力归属,只是为资产阶级成为统治者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掌握政权,成为统治者,他们的权利和利益通过国家获得保障和实现,而唯独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当历史唯物主义地思考社会问题时,贫困问题就被凸显,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斗争方式,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2]395}。所以,笔者认为,在马克思这篇文章里,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结果,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可以说,整体观点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在我们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的时候,我们

才能够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找到实践的突破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是需要政治哲学的,它的政治哲学是无产阶级政治哲学,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旨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探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换言之,就是它如何使人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探究如何使社会实现丰足从而消除贫困。就此而言,马克思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出发,来充分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由于政治哲学在社会主义有存在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社会主义是孕育政治哲学的肥沃土壤。而一旦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超越政治的,因为国家、阶级、政治等在共产主义社会消亡,因此,政治哲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是把政治哲学置于社会主义之中思考的,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出发阐发他的政治哲学观点的。所以,笔者认为,对社会弱势群体主体的生存的关注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而只有当以唯物史观视角关注社会问题时,社会弱势群体(残疾、同性恋、妇女儿童、孤寡老人、失业者等)的生存才成为被政治的哲学思考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它在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那里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注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81.
- [2]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恩格斯.英国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arx Thought on the Poverty: Comment on A Prussia's Interpretation of Prussian King and Social Reform

MA Juir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society as a whole, Marx expounded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He criticized that Lugar, a Prussia with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s, blinded social instincts with 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real causes of poverty i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Marx found the realistic basic reason for proletariat's inability to eradicate poverty was the socialism. He then expounded that a state must eradicate bourgeois society if it wants to eradicate poverty, and destroy the political state of its own. Only in this way, the proletariat can get the liberation. Marx established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giving concern on the poverty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vulnerable social group. Marx's social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working class surpassed that of the bourgeois.

Key words: Marx; poverty; politics

(编辑:蔡秀娟)